

# 注重思维的发展与转型：刘建军教授访谈录

## Cultiv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u Jianjun

王立宏（Wang Lihong） 刘建军（Liu Jianjun）

**内容摘要：**刘建军教授的研究视野宏阔，成果丰硕，其学术耕耘广泛覆盖小说理论、中世纪文学、拜占庭文学、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等诸多领域。在本篇访谈中，刘建军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积淀的研究经验指出，尽管涉猎广泛，其研究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环节展开，即对思维方式及其演变规律的把握。在他看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层本质，在于探究不同民族思维模式的异同。因此，研究者应当在方法论层面自觉实现双重融合：既要将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的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将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融会贯通。访谈最后，刘建军教授进一步强调，在新型认知方式的持续推动下，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观念与机械因果论必将被超越，一种更加综合、辩证的思维方式正在逐步确立。

**关键词：**思维；发展与转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王立宏，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刘建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时期美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借用与碰撞研究”【项目批号：24BWW05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ultiv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u Jianjun

**Abstract:** Prof. Liu Jianjun's research fields are extremely broad, covering various areas such as novel theory, medieval literature, Byzantine literature, Christian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as well as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He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each of these fields. In his research across numerous fields, Prof. Liu summarizes that in his research across numerous fields, he has always focused on a central point, namely,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its changing patterns. Prof. Liu believes tha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final analysis, is the study of the thinking patterns of different nations. In research, researchers must organically combine Western and Chinese modes of thinking, as well as humanistic rationality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Prof. Liu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cognitive methods,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simple causal theories will be superseded, paving the way for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 new intellectual framework.

**Keywords:** thought;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uthors:** **Wang Lihong**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Studies,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157011,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wanglihong1971@163.com).

**Liu Jianjun**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medieval Europe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Email: liujj@sjtu.edu.cn).

### 一、文学活动中思维的重要性

**王立宏**（下简称“王”）：刘教授您好，您在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成就斐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后辈学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采访到您。据我了解，由于时代的原因，您的学习经历比较特殊，这促成了您独特的学术成长路径。您能否就此谈谈二者的联系以及您对此的感悟？

**刘建军**（下简称“刘”）：与我们这年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接受系统性学校教育的总时长约为12年。1963年小学入学，但只完整地念完了四年，小学五年级就赶上了“停课闹革命”。1970年再次复学，就已经成了高一年级的学生。学了一年多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1971年底，就中学毕业了。1972年2月，我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开始了四年农村的插队生活。1977年2月，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东北师范大学（当时校名为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在三年的大学学习生活之后（其中有半年时间在农场劳动），我留校做了一名见习助教。随即以支教教师的身份，去西藏师范学院（今天西藏大学的前身）援藏一年。1983年9月我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李忠玉教授），学习了三年。1987年毕业后继续留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92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8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要说，我受系统学校教育的年限只是今天的学生所具备的基础教育的水平。但有幸的是，“文革”期间和插队时期乃至援藏期间，我形成了自学习惯，大量阅读了中国古代文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还发表了一些诗歌、小说等作品。因此，从反思今天的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可能基础教育时期真的不需要那么长的学校学习时间，而培养学习者自我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思

考习惯更为重要。

王：我发现，您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有小说理论、中世纪文学、拜占庭文学、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以及教学理念与方式等诸多不同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面，您似乎始终把握着一个中心环节，即思维方式及其变化规律。能否就这一点，集中谈一下您这样做的缘由？

刘：1980年初留校以后，正是改革开放的初起时期。和很多青年研究人员一样，我的研究，开始时也是走了一条为学术而进行研究的路子。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学者思维方式能否跟上时代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开始向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维度转换。就是说，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则，不管研究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维跟上时代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我认为，倘若一个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是跟上时代的，是先进的，那么，无论研究什么领域的问题，都会得心应手，所谓“形散神不散”，是之谓也。由此，我逐渐形成了对思维重要性的认识：第一，一个学者的思维必须是辩证发展的而不是僵化静止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很多学者，大量引进西方的或外国的理论，这对冲破当时的思想僵化以及陈旧的思维定势，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很快发展到一些人唯西方马首是瞻，一切都要向西方或外国学习，主张大量引进，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随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人们的道德滑坡、信仰迷失后，又出现了寻根派，主张全面复兴国学，试图到老祖宗那里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这两者其实都是思维上出现了问题。为此，我们必须把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行有机结合，即使在今天科技和人文密切结合的时代，也要看到，人们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能完全是人文理性的，也不可能完全是技术理性的，而应该是二者结合的，是平衡的。同样，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决定着我们的思维一定不要僵化。第二，新的思维方式的创新必须是在对现实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过程中建立的。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探索，它提出了或显示出了众多亟待解决或必须要清醒回答的问题。既然这些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也就决定着我们必须换个角度或者说换个思维看问题。专业学者以知识体系严整见长，这就决定着他们对社会的发言必须要在系统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来全面地和辩证地看问题。他们既不能跟随原有的知识体系跑，也不能根据大众的情绪走。他们的发言，应该是严整的知识体系、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理性思索三者的辩证统一。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创新，必须要把重点放在基础理论的创新上。而这种创新其实又是与交叉、应用研究密切相关的。因为只有随着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入，随着多学科的知识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才能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思考问题的方式，才能更好地突破所谓的“纯”基础研究的局限。换言之，以研究重大问题和回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为导向，以创新基础理论为目标，来促进研究

者思维模式的创新，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面对的主要任务。

**王：**刘教授，您对思维重要性的强调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那么，您是如何起步并逐渐走向深入的呢？

**刘：**对这个问题的注重应该说是我终生坚持的目标，大致地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思考研究文学与文化、文化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写作一些研究外国文学的论文时就已经感到，当时国内学界那种单纯地进行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分析乃至文学思潮的介绍，虽然适应改革开放之初急需引进外来文学的时代需求，但视野却过于狭窄了。随后出现的重形式、重艺术技巧的研究，更走向了纯艺术手法的展示，这使我感到，倘若抛开对外国人的思维认识这一前提，所谓的文学研究不过是个人独自品鉴的自娱自乐的行为而已（当然这也是需要的）。我坚信，研究外国文学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来把握域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性，从而为我们认识域外文化提供借鉴。

为此，我开始集中考察思维和文化关系的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学术积累，我在2000年前后，写出了学术论文“关于文化、文明及其文明比较研究等问题”<sup>1</sup>，提出了“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思维（包括情感）上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总是通过特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正是因为人能够通过思维建立起和自己、和他人、和世界之间的联系，人才真正脱离了动物界、进入了人类社会。换言之，正是由于人类独有的精神与情感活动——即思维活动——才使得文化成为人类的专属。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思维活动”指的是人不仅有“思”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还有“维”的能力，即把一些凌乱的“思”整合编织成一个精神系统的能力。所以，有“思”、有“情”不是人的特性，一些高等级动物也有这个特性。人比其他动物高级，关键在于他能够把偶尔的“思”和单纯的“情”变成“思维”和“情感”，把个体的偶然的“思”和“情”变成一个精神意识和情感的网络世界，说到底，人能够把自己的精神意识和情感活动变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那么，当人一旦可以通过精神意识情感活动建立起一个超越肉体的和物质的世界时，我们就可以说文化产生了。可见，所谓“文化”，其本质是人精神上、意识和情感上的联系——思维联系。

但思维联系又不能等同于“文化”。这是因为任何思维之间的联系又不能脱离开有形的载体而存在。精神联系或思维联系作为空灵的东西的特性，又使得这一联系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所以，“文化形态”又是人所独有的精神意识和情感活动的表现形态——没有这种形态，也就没有了“文化”。这也就是说，正是有了这种联系，才决定着人考虑在人与人

1 参见 刘建军：“关于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研究等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2（2002）：5-12。

之间如何相处时形成了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文化形态；才形成了如何思考问题和认识问题的现代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形态；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即行为方式文化形态以及形成了人如何生活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所以，所谓“文化形态”是人的精神意识情感之间联系的不同的物化显现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文化作为人唯一所具有的意识 and 情感的产物，其底蕴反映着人的精神活动。”

既然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那么，人的思维的活跃性和精神活动的不间断特征就决定着任何文化都是动态的文化，任何文化形态都是活的有机体，亦即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例如，我们谈古代希腊文化，其实我们要谈的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僵死概念和没有生命的知识范畴，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考察，本质上是通过各种历史遗迹和历史资料乃至各种历史现象，来把握当时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联系的运动过程，来揭示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中所体现的人类思维特征和认知能力，以及它们所达到的程度——本质上是对当时人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的自觉把握。

由于文化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人与人之间的思维联系的表现形态，这决定着文化不仅有着发展程度的差异，而且还有着性质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性质的差异中还包含着不同系统文化内容的差异和先进与落后的差异。所以，我们可以说，文化不仅有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区分，而且也有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差异，更有着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差异等不同划分。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我发现了只有人类才有思维，而能够思维和会有效地进行思维才是人最本质的特征。换言之，人是有思维的高等动物，研究人说到底就是研究人类的思维，研究不同的文化，说到底就是研究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冲突说到底就是人类的思维差异造成的。当然，思维方式的差异又是由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等所规定的。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中，我发表了一系列代表此时期思想探索痕迹的著作，如《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1994）《演进的诗化人学——文化视域中的西方文学传统》（1998）《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2023）。基本上是从思维与文化联系的角度，探索了西方文学的基本特征。

**王：**您的思考高屋建瓴且卓有见地。那么，在形成了这样的初步认识之后，您是如何做进一步研究的？

**刘：**在上述看法形成的同时，我还结合自己从事的外国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实践，从文化的角度开始追问不同人群思维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阶段探



索的主要标志是完成了“人的本质和：‘不完整主体’理论及其应用”<sup>1</sup>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从人的本质探索入手，主要探索了人既是肉体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群体的存在；既是历史的存在物，又是现实的创造者。因此，决定着对人的说明必须是全方位的。而把这诸多方面结合在一起从而对人进行全面的说明，突破口在于承认人是本能、本性和本质的合一，而其粘合剂就在于将人的思维形成的原因和发展过程进行重新说明。

关于主体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着一个模糊的认识，就是一说到主体，就是实体性的主体。如“人是主体”“自然是主体”抑或“神是主体”等。实体性的主体理论的弊端有二：首先，相对他者而言，意味着主体支配一切，某一个主体的支配作用被强化了，这就打破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互补关系。以“人是主体”为例，如果强调人在与外在他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这就会导致一种抽象的、僵化的或机械的“人是中心”的“逻辑斯中心主义”思想的出现，从而破坏了人与他者之间的和谐互补关系。还要看到，“人是主体”只是对外在的他者而言的，无法说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究竟谁是主体。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然而，正如人文主义者后来发现的那样，很多矛盾、冲突和毁灭都是在人的主体内部发生的，即同为主体的一部分人毁灭了另外一部分也是主体的人。这样两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导致了传统主体论的破灭。以上两个矛盾中隐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即“人是主体”始终用一个抽象的、没有具体内涵的概念，去定位“人”这样一个具有无限丰富性的对象，造成解决问题的简单化。传统的实体性的主体论的弊端意味着传统的“人是主体”的说法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伪命题。因此我们要对今天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人是主体”的理论进行重新阐释。

我认为，人是主体。但同时要承认，人又是“不完整的主体”。原因在于：第一，从人与对象的宏观角度而言，在人类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人类和对象世界都是不完整的主体。这是因为，人和对象之间，都是以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存在的。第二，在人与人的内部关系中，每个个体也都是不完整的，社会是由亿万个“不完整的个体的人”组成的。这就决定着人与人之间也是互为对象的不完整主体关系。因此，人类必须建立和探讨个性和群体的关系问题，才能生活得更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说到底都是当时的人们达成的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调适方式。历史发展了，矛盾变化了，新一轮的调适或变革也就开始了。“不完整主体”的理论不仅强调个体的不完整，同样还强调个人的“在场”和平等的。个体在场，是指个体在群体中发生积极作用和联系，历史上不存在一个贯穿着古今的抽象意义

1 参见 刘建军：“人的本质和‘不完整主体’理论及其应用”，《东北师大学报》1（2008）：122-128。

上的“人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在场的关系，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的人有着不同的在场方式，同时也构成不同的关系。传统“人是主体”的理论，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它内部各种要素的不平等。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不平等的，自然是人改造的对象。同样，文艺复兴以来所建立的“人是主体”理论，其实是权利话语掌握者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其实，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构成真正的主体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或“等同”，“平等”是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存在的，正是因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才有平等观念提出的必要。因此，处于平等关系中的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不完整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不是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对立并不完全等于本质上的冲突，统一不等于形式上的调和。有时候同质间的对立，程度上的差异，数量上的差异也构成对立统一关系。

## 二、文学活动中西思维的差异与互补

**王：**您的这种阐释非常深刻，这必然会涉及到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思维差异问题。您可否接续上述思路，从外国文学研究的实践中，谈一谈中外（尤其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刘：**你的问题非常好。这不能不提到我所写的这个领域的第三篇文章“思维方式差异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性”<sup>1</sup>。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化冲突本质体现的是思维差异之间的冲突。对此，卡尔·普利布兰姆（Karl H. Pribram）在《思维方式之矛盾》中也指出：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睦的关系之所以受到阻碍，不仅是由于语言的复杂多样，更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就是说，是由人们确定知识来源和进行有条理思维方法上的差异所造成的。<sup>2</sup>把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差异看成是思维模式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可谓抓住这个问题的牛鼻子。要考察思维差异，必须要从思维的出发点说起。一种文化的每一形式语言及其进化的历史，都要依附于其源头性的点。换言之，当一个文化体系在漫长的文化实践中开始形成的时候，究竟它是以概念本质论为出发点，还是以关系本质论为出发点是其根本的分野。

中国思维方式的起点，源自“阴阳”关系学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起源于《易经》（即《连山易》，以艮卦开始；《归藏易》，以坤卦开始；《周易》，以乾卦开始）。相传《周易》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

1 参见 刘建军：“思维方式差异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性”，《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1）：117-128。

2 参见 拉里·A·萨姆瓦：《跨文化传通》，陈南，龚光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66页。

翼》。春秋战国时代，是老子将《周易》的思想精华融入他的《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老子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在认识阴阳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得出了世界的本质是“道”的思想。在老子看来，事物的本原是无所不在的性质相反的各种要素在运动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变异的抽象关系本身。故“道”才是万物的宗主，是最初之力，是世界的原动力。由此可见，老子的“道”其实是一种总体性的关系本质论的抽象说明。这也说明，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的“道”和辩证法就是一个东西：“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然“道”是抽象出来的本质性的关系本身，由此，中国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推理演绎范式——朴素的辩证法持续不断地运作方式。老子以关系本质论意义上的“道”为核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方式，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这一观念也被后来众多思想家们所继承。中国哲学是以关系本体论（亦即朴素的辩证方法论）为起始的。中国的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概念本体论，而是关系和方法本体论的产物。

从中国哲学产生和汉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的中华文化体系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中国文化一直是一个以抽象的关系性和辩证法为本质运作而成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把众多的文化思想和不同文化流派的观点融合在一起，主要原因在于其逻辑起点是以关系性本质为内涵的“道”运作的结果。这决定着其能够在发展中融合进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从而不断完善着中国思维的独特品格。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不断地在“两极对立中寻求他们的综合”的发展着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在被不断创造的过程中，既是超越现实的，也是完全依据于现实的；其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对立的，也是不断转换的。第三，既然中国文化体系是以关系本质论为开端，从朴素的辩证法入手来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并强调其运动特性之作用的，所以它不太注重所谓本质性概念内涵的抽象和精确，也不太在乎逻辑自我演绎过程中的程序严谨与边界的清晰，而是在不同要素关系的频繁运作中，使其不断呈现出适应于不同时代要求的本质规定，从而去适应现实不断发展的要求。这也就说明，以方法论为前提建构起的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或边界的弥漫性。这里也需要申明的是，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进行着关系运作的开放性体系，并不是说它的主张是开放的，也并非几千年来从事中国文化建设的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都是具有开放意识的，而是说它的文化结构自身是具有开放性特质的。换言之，它的独有的思维起源方式以及功能性阐释问题的方式，决定着其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内在开放性。恰恰是中华文化所暗含着的这种本质性的开放结构，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在现实的不断危机中，尤其是在偏离了开放性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很快纠偏，才能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在千余年中绵延不绝的传承和发展。



与中国的情形不同，西方文化则是以“概念本质论”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所建构起的文化体系，即一切从一个原初的实体本质性的概念或观念，亦即“逻各斯”出发，并由较为严密的逻辑推演而成。我们知道，“逻各斯”（希腊语 λόγος；英语 logos）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概念。这个词最初是含混的，即指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事物的本义或本原，它又可被理解为世界本原意义上的“原则”“规律”等，也有“语言”或“理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希腊词具有本质的含义。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是最早将“逻各斯”这个概念引入哲学领域的。在他著作的残篇中就说过，虽然世界万物变幻无常，但人们能够把握它，就是因为万事万物的背后有一个本质性不变的东西。这种内在的本原即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这一思想主张被古希腊古典时期的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继承。他们均提出了“理念说”。例如，柏拉图在《国家篇》最后一卷的一篇序言里对“理念”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柏拉图解释道：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名字的，它们就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sup>1</sup> 亚里士多德在承认“理念”这一点上与柏拉图是一致的，他也承认“理念”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在晚期希腊一些哲学学派里，斯多亚学派（斯多葛学派）学者是“逻各斯”观念最重要的提倡者和发扬者。把希腊哲学“逻各斯”概念和犹太-基督教的“上帝”进一步联系起来的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宗教哲学家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斐洛认为“上帝”是高于世界的存在，“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乃至人类社会，它本身就是“逻各斯”。到了中世纪发展阶段之后，在基督教文化统辖下，“上帝”完全成了“逻各斯”的同义语。自文艺复兴开始，以“上帝”为内涵的“逻各斯”开始发生了变化，“至善”精神成为了新兴资产阶级眼中“逻各斯”的新内涵。作为康德（Immanuel Kant）道德哲学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历史哲学的“理念”，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在这些看法中，“逻各斯”都是一个类似永恒的本质性的概念。既然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是以“本质性的概念”（逻各斯）为出发点进行的思维，那就必须重视这个“本质性概念”的起始作用，所以，在这种方式中，清晰而抽象的本质性的概念定义是逻辑演绎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哲学家们发明了自己的逻辑演绎方式，其大体理路是：“逻各斯”（或曰“理念”“上帝”“至善”等）是一切具体事物的唯一本原，它虽然无所不在，但又无法具体加以认识和把握。因此，“逻各斯”首先要分化出自己的物质实体，即纯粹精神的对立面——物质世界，由此导致“二元对立”的产生。同样，在这个总的规定下，它也就决定着其所产生物质世界中的人和人类社会，也就有了内在的冲突，即个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冲突。最终是期望精神战胜物质，重归“逻各斯”的本体。从本质概念或“逻各斯”出发来思考问题也说

1 参见 Plato, *Republic*, translated by G. M. A. Grube,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268.

明,在这种文化体系中,人类的知识是先验性的,或者就是理念或神本身。这意味着人世间所有的知识在自己的历史中是本无的,只有逻各斯(神)的出现才为他们提供了知识,因此他们才需要从最初的概念(逻各斯)出发,用严密的逻辑方式来论证并显示这个知识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神启”,也是典型的从中世纪到17世纪出现的先验论哲学的根基。综上所述,西方的思维方式重视两个东西:一个是本体自身的不容置疑的先在之存在;一个是逻辑演绎严密性和排他性的先天性规定。或者说,逻辑的演绎要求论述边界的清晰和论证过程的严谨——两者决定着其思维过程和由此建立的文化体系具有先天的封闭性特质。

在上述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重要的结论:两种思维模式或两种文化的融合,可能是解决未来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的途径。我们知道,未来社会的发展,已经流露出人文与科技的混合性特征。西方人思维侧重元素,善于运用超自然的理念和形式逻辑思维,在认识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领域具有优势。而中国人侧重关系,善于整体性地把握和辩证思维,在认识人文社会学领域更胜一筹。所以,这就决定着两种思维方式或两种文化之间的互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天人文和科技融合的时代,也是必然的。惟其如此,才能创造人类数智时代文明的新的辉煌。

**王:** 您的分析十分精当且严谨,倘若以此为根据,您又是怎样把中外文学研究引向中国和欧美(西方)文学在本质上的差异上来的呢?

**刘:** 我毕竟是从事文学,尤其是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但我见到的很多学术著作在谈到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差异性的时候,总是存在诸多问题,留下诸多遗憾。不论是从地理的或是历史的,抑或是地缘政治的角度,我们都难以将其界限划分清楚。因此,我就觉得,在当时(2010年前后)有必要换一个新的视角,即人类维系方式的视角,也即思维变化的视角,来对此做一番新的思索。

维系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还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人的社会性决定着众多的个体总是要结成为一个个不同的群体。换言之,人类有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每个人一出生就会成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从大的范畴说,全世界的人组成了人类社会。从小的范畴说,不同地域的人组成小的社会共同体,如家族、部族、民族或国家等。因为只有形成了社会群体,人类才有可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才有可能形成各自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以,马克思才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考察维系方式,无疑就是在考察构成人类文化最基础的东西。同

<sup>1</sup> 参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时也是考察不同文化差异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

由于受地理的、自然的等生存条件以及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的制约，人类社会所采用的“维系方式”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承认有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之分，可以说，正是由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维系方式，从而决定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文化与文学的不同。由此，所谓的“西方”和“东方”，“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范畴，就不仅是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乃至所谓纯粹文学意义上的范畴，它应该而且必须是基于“维系方式”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学意义上的概念。

具体说来，西方文学是西方社会特有维系方式的产物。在“四大维系方式的更迭与西方文学的发展流程”<sup>1</sup>一文中，我曾指出，西方社会经历了四大维系方式的替代演变。第一种维系方式是“血缘维系方式”。这种方式指一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组织，主要是靠血缘力量维系起来的。血缘维系方式发源于人类最初阶段。人类远古的时候每个部落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或母亲（后来逐渐演化成“祖先”）。在远古的历史条件下，所谓家族、氏族或部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与这个“祖先”有着血缘上的天然联系。换言之，血缘维系方式是以血缘力量形成了以某个“血缘家长”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社会自然等级制度。正是这种血缘维系关系，造就了当时人们思维的出发点和情感的价值取向，即绝对服从带有父亲意味的酋长和首领，并把对家族或部落的忠诚当成天然的责任。第二种是“信仰维系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部落联盟日益取代了以单一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部落，尤其是当部落联盟发展到民族国家的时候，众多的不同的血缘家族或部族进入到其中来了。在此种情形下，人们就不可能再信奉某一个血缘或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了。那么，此时要想把不同的血缘部落、不同的血缘民族的成员聚合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就必须要有个让各个部族的人都可以接受的精神上的“父亲”。于是，神学宗教意义上的“一神论”开始出现。在西方，主要是基督教文化的出现承担了建构这个独一的“精神父亲”的使命。基督教的上帝，更有其作为“精神父亲”的特性，从而适应着西方民族或国家形成时期维系社会整体的需要。第三种是“理性维系方式”。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到了启蒙时代，人的理性能力开始增长。于是，人们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思考所认为是真理性的东西，成了把具有相同思想观念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力量。“理性维系方式”的基本内涵在于，此时社会的维系力量是被人们认为是真理性、科学性的观念。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理性”总是作家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核心概念和侧重点。现代社会文化间冲突的不断激化导致着一种新的维系方式——“人类共有价值维系方式”的萌芽。所谓“人类共有价值维系方式”是指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尽

1 参见 刘建军：“四大维系方式更迭与欧美文学价值流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3）：86-93。

管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与价值取向，但作为人类的成员，必须还要有整个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尺度。因为只有普遍适用的价值，才能将各种文化中的共同性价值因子提炼出来并被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

王：可以说，您从文化或思维的角度，清晰地梳理出了西方社会思维变化乃至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发展流程特征，这是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那么，东方社会的维系方式又有哪些特征呢？

刘：我认为，东方世界没有西方社会这样鲜明的四大维系方式更迭替代的演进过程。各个东方民族的发展历程中，“血缘维系方式”是一个持久不衰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东西。东方世界最早出现的维系方式，走的也是与西方民族同样的“血缘维系方式”之路。现有的大量历史文化材料告诉我们，在古代东方，最早出现的也是靠血缘维系所组成的家族、氏族、部族和部落联盟等为单位的一个个社会群体。而构成这种群体的或社团的维系力量的，也是血缘的力量。这一点在每个东方民族的早期神话、考古等材料中，比比皆是。甚至最早的女神崇拜（如东方各国的众多“大母神”神话）和随之而来的父权制形态下的男性祖先崇拜，其本质都是血缘维系方式的典型体现。在此基础上，血缘意义上的父亲，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逐步演化成了民族的“祖先神”。问题在于，当西方社会从“血缘维系方式”开始向“信仰维系方式”和“理性维系方式”依次转换的时候，东方世界却一直把“血缘维系方式”持续地继承下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和西方社会维系方式完全不同的发展演进模式呢？换言之，东方为什么没有形成西方那种四大维系方式更迭替代的发展模式呢？

首先，这是和东方世界的大陆文明以及独特的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亚细亚独特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东方早期国家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常常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顺应社会需要所诞生的国家形式。其次，东方世界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经过性质上的断裂。因此，可以说，东方以血缘维系方式形成的文化性质，一直没有断裂。再者，从诸神谱系上看，东方诸国的文化中，都有把一个祖先神变为民族共同的主神的过程。后来的宗教文化中出现的主神，都有着某个部族祖先（民族）神的影子、影响或痕迹。与西方的“传统”相比，东方世界各个民族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而寻找“传统”的时候，常常把目光转向古代，尤其是本民族发展的早期阶段所创造的祖先身上。这一特点对那些由较为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来说，更为明显。这其实也是“血缘维系方式”在人们深层意识上起作用的反映。

由此可见，由于血缘维系的方式一直是东方世界文化中的强大潜流，它在深层次起着作用，从而导致了东方世界文化发展的独特形态。如果说，西方世界自古至今是在四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维系方式的替代、更迭和发展演变的话，那么，东方世界的维系方式基本上是在血缘维系基础上所进行的拓展和延



续的演变方式。其主要的发展运作的模式大体上依据的是“血缘家族”-“血缘氏族”-“血缘部族”-“血缘民族”，从而形成了现代人们所说的东方民族传统或民族文化传统的演进流程和基本特性。正是基于东方这种血缘意义上的传统，才导致了与西方世界治理方式的差异。在东方世界里，我们看到东方人注重的不是法律而是传统，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习俗道德力量甚至仪式的力量（自然法）。

东方世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真正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发展脉络和轨迹，东方走了一条和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样，从维系方式的差异上来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能够使很多困扰当代学者的一些文学现象得到更清晰地说明。例如，东方近现代社会出现和其发展的特殊性问题。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是从它不同的维系方式第次取代的发展需要中，从其文化内部发展的思维逻辑中逐渐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可在东方，由于血缘维系方式的巨大惯性力量，19世纪以来很多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大体上都是在血缘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强制现代化的，或者说“被殖民现代化”的。这样就导致了东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被强制的进程。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因为传统的血缘维系方式是很难走向现代化的。这也是近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们为什么主张欲改造社会，必须要先改造人们精神，要进行社会革命，首先要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层原因。应该指出，东方世界在走向“普适性价值维系方式”的过程中，与西方社会相比可能更为艰难。这一则因为东方世界的社会发展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另则是东方世界在维系方式的转换中，也不能完全丢掉自己的传统，去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因为那不符合东方各国的国情。这也决定着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能适应今天的发展。

### 三、数智时代文学活动中思维的转型

**王：**在您的多篇文章和数次讲座中，您多次提到一个观点：“农耕时代、工业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今天人们进入了数智时代，也必须要有适应于这一新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那么，按您对思维方式发展性的重视，您认为我们今天在数智时代，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刘：**在这一新的文学活动时代，人工智能与人合谋的文学活动成为主流趋势，从而使得在生活与文学、情感与理性、真实与虚构和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崭新特征。而这种新的特征其认知基础来自于对传统哲学主客观论、“二元对立学说”以及简单因果论的颠覆，形成了“存在”和“意识”、此者与他者之间的混杂性会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和数智时代的到来，量子力学、元宇宙、信息数字技术等越来越引发了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思维转型的思考。对此，国内外很多哲学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今天出现的“新



唯物主义”学说。应该说，新唯物主义的出现与21世纪人类面临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危机密切相关。因此，新唯物主义为构建万物和谐共处提供了新的视角。新唯物主义试图超越传统的二分法，旨在为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和生态提供新的见解，旨在解决当代技术、科学和生态产生受物质影响的生命的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状况。例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面向对象本体论和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的生命物质概念等现代物质理论都反对传统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对一切对象的忽视和边缘化。相反，他们信奉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方式。拉图尔在《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中曾强调，以前的社会研究模式忽略了对对象，致使这些对象无处可说，但却无处都可感受。在拉图尔看来，世界是各种非本质实体不断涌现和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现代世界依赖于混合和组合的功能。<sup>1</sup> 简·贝内特在2010年出版的《充满活力的物质》（*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无机和无生命物质的能动性。<sup>2</sup>

综上所述，今天对“存在与意识”的科学理解应该是：“存在”和“意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是一个互为前提的辩证发展过程。也即说，“存在”就是“意识”，“意识”就是“存在”。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在生活中有了某些感受，导致其形成了意识活动。也就是说，当一个思想或观念、看法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时候，它毫无疑问属于“意识”的范畴。所以，“意识”是流动的、不断发生变化的。而一旦某种“意识”以固定的形式保存下来了，就是“存在”（客观存在）了。“意识”和“存在”循环往复，不断转化，成了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的不断演进过程，从而变成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相互依存形态的出现。内容和形式、主观和客观也莫不如此。今天人们认为属于精神的东西，在转化过程中可能成为物质的东西。这也就是说，物质资源是一种客观存在，经过人们精神因素的作用过程（意识活动过程），最终形成了其带有人的智慧因素的物质精神合一的存在形态，并且越到后来，这种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混杂性会越来越明显。由于哲学基础的变更，也导致了对当下主体关系的思维的变化。增强技术模糊了人体和技术之间的界限，而不断发展的智能机器人挑战了人类的主体性。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和重新评估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要求我们放弃传统的二元论。在这个认知方式的影响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和简单的因果论被抛弃，新的思维方式将逐渐被建立起来。这一切均说明，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等机器，会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文学活动中来。而今天出现的多模态、人机互补等平等合作

1 参见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9-72.

2 参见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的文学样态将成为新的文学常态。

王：您从多年的研究实践中，提炼出所有研究的中心问题都是研究思维方式及其变化规律，您还进一步提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归根结底是研究不同民族的思维，并且指出了未来思维转型的走向。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再次感谢您拨冗接受我的采访。

刘：也谢谢你的工作。

## Works Cited

- Bennett, Jane.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Duke UP, 2010.
-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P, 2005.
-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Makesi Engesi Wenji* Vol. 1,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刘建军：“四大维系方式更迭与欧美文学价值流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3）：86-93。
- [—.“Changes of the Four Sustaining Ways and the Shift of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Value.”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13): 86-93.]
- ：“思维方式差异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性”，《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1）：117-128。
-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Mode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 (2021): 117-128.]
- ：“人的本质和‘不完整主体’理论及其应用”，《东北师大学报》1（2008）：122-128。
- [—.“Human Nature and Theory of ‘Incomplete Subject’ and Its Application.”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1 (2008): 122-128.]
- ：“关于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研究等问题”，《东北师大学报》2（2002）：5-12。
- [—.“On Culture Civiliz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 (2002): 5-12.]
- Plato. *Republic*, translated by G. M. A. Grube.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268.
- 拉里·A·萨姆瓦：《跨文化传通》，陈南，龚光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 [Samovar, Larry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translated by Chen Nan and Gong Guangm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